

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近来的研究趋势

——评 *JMF* 《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十年回顾》

张春泥^{*}

摘 要：2020年《婚姻与家庭杂志》（*JMF*）特刊发表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十年回顾》一文综述了2010年以来美国的离婚、再婚、继亲家庭行为研究的主要进展。本论文从离婚与再婚的趋势、成因和社会后果三个方面，概括了《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十年回顾》的主要内容，指出美国过去十年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研究围绕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婚姻已成为一种持久的分层和制造分化的机制，一方面进入和退出婚姻愈加受到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等分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婚姻的变化也制造了持续的社会分化与结果不平等。论文还介绍了中国学界对离婚、再婚、继亲家庭研究的概况，比较了中美不同的研究情境，并指出国际经验中值得中国学界借鉴和重点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离婚 再婚 继亲 中美比较

在婚姻家庭研究领域已拥有 75 年历史的著名国际期刊《婚姻与家庭杂志》（*JMF*）于 2020 年推出了一期特刊，分专题回顾和总结婚姻家庭研究在过去十年的最新发展。《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十年回顾》（下文简称《十年回顾》）便是其中之一，该论文综述了 2010 年以来美国的离婚、再婚、继亲家庭行为研究的主要进展，并结合来自欧洲国家的跨国比较证据，总结了近十年来美国家庭在婚姻破裂和重组方面发生的主要变化及其

^{*} 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社会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调查。就上述领域已在《社会学研究》、《社会》、*PNAS*、*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著有专著《离异家庭的孩子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社会后果。此论文在 *JMF* 官方网站上线后, 一度成为 2019~2020 年间 *JFM* 发表下载量排名前十的热门论文之一, 足见这一议题具有很高的关注度。该论文的两位作者之一, 凯莉·雷利 (R. Kelly Raley) 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社会学教授, 曾任美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部的主席, 她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事家庭人口学研究, 研究议题聚焦于单亲、同居、离婚的趋势与特征。另一位作者, 梅根·M. 斯威尼 (Megan M. Sweeney) 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教授, 她也曾被选为美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部的主席,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她在避孕、生育、再婚、离婚等议题上有诸多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位作者的研究生阶段均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接受的学术训练, 从这篇论文也可以看出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的学术传统, 即在探讨家庭社会学议题上具备人口和社会分层的视野。

一 美国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的研究

美国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的研究起步较早, 在选题、数据分析和方法上已相对成熟, 而美国学界对这一议题的重视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首先, 美国早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就经历了离婚率的快速上升, 在 80 年代中期达到高峰, 三分之二的初婚预计会以分居或离婚告终 (Martin & Bumpass, 1989), 虽然此后的 30 年, 美国的离婚率水平有所下降, 但仍然处于高位, 正如《十年回顾》所言, “美国一直以来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次, 如同《十年回顾》所引用美国人口学家拉里·班帕斯 (Larry Bumpass) 的论断——“没有什么变化比大多数婚姻不再白头到老这一点更彻底地改变了美国的家庭生活”, 离婚率的上升导致了美国社会的代内和代际不平等的再生产。1985 年, 美国社会学家魏茨曼 (Weitzman, 1985) 在其代表作《离婚革命: 美国妇女和儿童意想不到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中指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离婚第一年会导致美国洛杉矶的单亲母亲生活质量下降 73%, 而男性的生活质量却有所上升, 这一

发现引发了后续一系列探讨两性离婚经济损失不平等的研究。离婚不仅给离婚者造成经济损失，还会对下一代的成就与福祉产生不利影响。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保罗·R. 阿马托（Paul R. Amato）对相关研究的综述，大量经验证据已表明，离异家庭子女在社会成就、心理适应和其他人生发展指标上均不及父母婚姻完整家庭的子女（Amato & Keith, 1991; Amato, 2001），而且离异家庭子女的发展劣势并没有因为离婚的社会污名随时间推移减少而有所降低（Amato, 2001）。立足于上述美国长期积累下来的研究基础之上，《十年回顾》主要从趋势、成因和后果三个方面来总结美国离婚、再婚、继亲家庭研究的新进展。

从趋势上看，美国过去 30 年的离婚率呈下降趋势，但这一变化背后体现了不同人口或群体婚姻行为的分化。一是年龄分化，离婚率在青年队列中有所下降，但在中老年人口中却显著增长，形成“银发离婚革命”的现象。二是阶层分化，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更可能进入并保持稳定的婚姻，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则越来越难进入婚姻，或以同居代之，因此被排除在离婚的风险集之外。当同居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伴侣形式，美国的再婚率也呈下降趋势，但人口中有再婚经历者的比例仍在上升。与初婚相比，再婚存在更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再婚，且这一性别差异在中年以后更为突出。但与初婚模式类似，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了人们在再婚市场中的机会。美国的继亲家庭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略有增加，但其复杂性逐渐受到重视，比如包含继父母、继兄弟姐妹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姐妹关系的“拼盘家庭”，以及继祖父母和继孙子女之间的关系。

从离婚的成因上看，美国学界在过去十年对婚前同居、女性就业、受教育程度这三大离婚预测因素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更新。婚前同居仍然与较高的离婚风险相关，其原因一方面是选择性，另一方面是生命历程因素，比如同居导致“奉子成婚”或早婚等。随着同居从不寻常到变得普遍，并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扩散，这一变化降低了同居人群的选择性，因此一些研究发现，婚前同居与离婚风险正相关性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早期研究深

受贝克尔的经济独立假设的影响,认为女性就业会增加其离婚风险。但近期研究挑战了这一因果关系。首先,这一关系可能是反向因果效应:未必是女性就业增加了离婚,而是女性可能预期到婚姻的不稳定而主动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其次,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期待已发生变化:随着女性就业机会增长、双薪家庭增多,妻子就业和争取收入的行为已不再被污名化,如今也不再成为其婚姻破裂的原因。正因如此,妻子就业与离婚风险的增加已仅限于特定人群,比如早期的婚姻队列或婚姻满意度较低的家庭。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受教育程度与离婚风险之间呈负相关,早期的理论解释主要是婚姻压力模型,即受教育程度低的夫妻面临更多的财务压力,导致其婚姻质量差,更容易破裂。但近十年的研究却发现,收入在提高婚姻质量或满意度方面的作用其实相当有限,与其说教育、收入和财富是通过减少财务压力和提高婚姻质量来降低离婚风险,不如说这些因素增加了离婚的难度:高学历、高收入的夫妻更担心离婚会威胁到财产水平、消费模式,以及家庭对子女的密集养育投入。

在离婚的社会后果上,过去十年的研究仍然延续前面提到的代内和代际两条脉络,一是探讨离婚对成年人福祉的影响,二是探讨父母离婚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在成年人福祉方面,女性在离婚后仍然比男性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这一损失虽能被女性的劳动参与减轻,但仍可能产生长期影响,尤其是不利于中老年女性的财富积累。从这个角度来说,再婚可能是比提高劳动参与能更有效地恢复女性经济状况的途径,这也意味着离婚经济后果的性别不平等仍然成立。过去十年,还有大量探讨了离婚与成年人健康和幸福感的系的研究,集中得到的结论是:离婚至少在短期内会造成心理健康和总体幸福感的下降——符合危机模型的观点,但离婚是否会导致身体健康的恶化则尚无定论。在后代福祉和成就方面,学界在过去十年已不再把研究视野局限在某一次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而开始探讨后代在整个童年期所经历的家庭不稳定带来的长期影响。离婚只是造成家庭不稳定的一类事件,父母反复进出同居和婚姻关系、父母以外的家庭成员进入和离开家庭均是家庭结构不稳定性的来源。过去十年的研究表明,儿

童面临的家庭结构转变越多，他们的平均福祉水平越低，但也存在异质性：在美国，越是父母不太可能离婚的家庭，父母一旦离婚对子女教育成就的负面影响越大。在继亲家庭方面，过去十年的研究聚焦于继亲关系的性质，尤其伴随“银发离婚”的趋势开始关注中老年父母与成年继子女的关系。这些研究普遍发现，继亲家庭的代际资源传递相对更少，在老龄照料、财产继承等方面会面临一定的特殊挑战。

总的来说，《十年回顾》反映出美国过去十年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研究围绕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婚姻作为一种持久的分层和制造分化的机制。首先，进入和退出婚姻愈加受到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等分层因素的影响。经济条件优越者更可能进入婚姻，其随后的婚姻稳定性正是源于其婚前经济地位的选择性。地位较低者则更多以同居替代婚姻，而同居关系较之婚姻更不稳定，当大量人口从结婚转向同居，这势必会成为家庭关系不稳定性增长的来源。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家庭行为变迁模式是以弱势模式（pattern of disadvantage）为主导——经济不平等导致了底层群体不稳定的家庭行为和支离破碎的家庭结构。其次，婚姻的变化也制造了持续分化和分层的后果。离婚对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离婚和家庭不稳定无疑会损害儿童的福祉——后者成为美国代际阶层固化的来源之一。在研究方法上，过去十年的研究借助于各种长期纵向数据调查项目和固定效应模型等因果识别方法，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审视、检验与认识上的更新，在选择性和异质性的问题上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研究内容上，既有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关系的框架中开始重视同居这种家庭形式，也开始关注婚姻变化的长期影响，以及中老年群体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关系。

二 中国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研究

《十年回顾》一文对中国的研究亦有启发，但需要关注到中国与美国不同的社会情境和各自所处的不同家庭变迁阶段。中国的离婚研究起步相

对较晚, 伴随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离婚潮”曾形成了一批研究, 有影响力的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徐安琪、北京大学人口学家曾毅等人的一系列工作 (例如: Liao & Heaton, 1992; 徐安琪, 1997, 2001, 2003; 徐安琪等, 1987; 徐安琪、叶文振, 2001; 吴德清, 1999; 曾毅, 1995; Zeng et al., 2002)。当时国内大多数研究侧重于探讨离婚现象兴起的社会因素, 对离婚社会后果的实证研究相对有限, 而且大多参考美国的相关研究结论。

2010 年以后, 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引入和入户调查项目的兴起, 国内婚姻家庭研究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对中国人的离婚、再婚、父母离婚对子女影响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实证证据。主要研究证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离婚的趋势, 二是与离婚和再婚风险相关的社会人口因素, 三是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首先, 从离婚趋势上看, 中国过去是一个离婚率极低的国家,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出现了“离婚潮”, 但离婚水平仍远低于西方国家。2003 年以后, 中国的粗离婚率加速上升, 在 2016 年左右超过了大多数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 (张春泥, 2019)。虽然以婚姻存活率来衡量的中国整体离婚水平相比仍不高 (於嘉等, 2020), 但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离婚水平差异明显 (Chen et al., 2020; 刘汶蓉, 2019; Wang & Zhou, 2010), 且队列差异变化突出——年轻一代的离婚水平比老一代更高 (於嘉等, 2020)。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离婚潮”时期, 学界大多会强调西方价值观念传播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外因作用, 但对 21 世纪以来的离婚率上升的研究已主要从离婚的去污名化 (施磊磊, 2020)、女性主体性的成长 (李永萍、杜鹏, 2016; 张晓冰、王记文, 2021)、经济不平等和阶层分化 (殷晶晶、班涛, 2021; 张雪霖, 2016)、人口流动 (马忠东、石智雷, 2017; 莫玮俏、史晋川, 2015; 石智雷, 2020) 等内生因素来解释。此外, 中国离婚率的变化也受到法律法规的影响, 例如, 2003 年之后粗离婚率的快速上升与 2003 年《婚姻登记条例》取代了 1994 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淡化了离婚登记的行政成本不无关系。我国于 2021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离婚冷静期作出了规定, 学界高度关注这一

法规的变化是否带来离婚率下降。目前的研究证据表明, 离婚冷静期的出台在短期内的确带来了离婚水平的下降(董浩, 2023; 宋健、李灵春, 2022), 但其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其次, 在离婚者的社会经济特征上, 中国的离婚行为长期以来更多集中在社会中上层——城镇或非农人口、经济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基于2010年之前发生的离婚数据的研究基本上呈现的都是离婚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存在正向选择的证据(例如: 许琪等, 2013; 吴德清, 1999; 曾毅, 1995; Zeng et al., 2002; 张春泥, 2019)。但近年来质性研究开始关注农村的离婚现象(如: 李永萍、杜鹏, 2016; 施磊磊, 2020; 王会, 2020; 殷晶晶、班涛, 2021), 也逐渐有一些针对近期离婚数据的定量研究发现, 离婚者社会特征的正向选择性减弱、离婚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如流动人口)中增多(例如: Ma et al., 2018; 马忠东、石智雷, 2017; 莫玮俏、史晋川, 2015; 张春泥、潘修明, 2022)。除了探讨离婚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外, 中国式离婚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点是离婚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生育子女是显著降低中国父母离婚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Ma et al., 2018; 徐安琪, 2012; 许琪等, 2013), 尤其生育男孩会显著降低父母离婚的风险(许琪等, 2013)。为数不多的研究探讨了与再婚行为相关的社会因素, 总的来讲, 随着中国离婚率的上升, 再婚率也出现了上升(Wang & Zhou, 2010), 社会经济地位与再婚行为的关系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促进了男性的再婚, 却降低了女性再婚的风险或可能性(彭大松, 2015; 杨记, 2007)。最后, 就离婚的社会后果而言, 中国人在观念上普遍认为父母离婚和单亲抚育对子女成长有害(张春泥, 2019), 但在20世纪90年代, 徐安琪等人对上海离异家庭的一系列研究发现, 父母离婚对孩子仅带来“有限影响”(徐安琪等, 1987; 徐安琪、叶文振, 2001)。这一“有限影响说”现已被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所验证: 鉴于中国离婚人群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正向选择性和代际支持的兜底作用, 父母离婚对子女学业和社会经济成就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张春泥, 2019; Zhang, 2020), 而且离婚者相对较好的家庭条件会对其子女长远发展产生一定的社会出身补偿效

应(张春泥, 2020)。不过, 父母离婚仍然有可能对子女成年后的婚姻与亲密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张春泥, 2019; Zhang, 2022), 但其具体机制仍有待深入探讨。此外, 近期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子女离婚对老年人的影响, 这是在中国的孝道文化传统和紧密的代际关系下值得探讨的问题。研究发现包括: 离婚后的儿子对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较少(Cong et al., 2023), 子女离婚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宋月萍等, 2022)等。

中国学界对离婚、再婚、继亲家庭的研究从边缘到主流的变化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首先, 与中国传统社会离婚率极低形成鲜明反差, 婚姻的不稳定性上升是引发中国学界对离婚问题日益关注的首要因素。其次, 在离婚者的社会经济特征上, 不同于美国呈现的“弱势模式”, 中国的离婚模式更多呈现“第二次转变模式”的特点, 即由观念驱动, 且在城镇或非农人口、经济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中相对普遍, 因此, 由离婚和家庭重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被巨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阶层差异所掩盖。或者说,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 城乡二元格局, 地区差异, 由教育、职业和收入形成的阶层分化是对社会生活更有解释力的变量, 家庭结构性的因素的解释力很小, 这也解释了为何父母离婚对子女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但2010年以后, 中国全面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 家庭行为的变化和分化都逐渐凸显, 这些变化和分化与既有的城乡、阶层、性别等分层因素相结合, 让家庭结构也开始成为制造分化的机制, 家庭研究逐渐成为显学, 对离婚、再婚和继亲议题的研究也开始与性别研究、社会分层研究相融合(张春泥、谢宇, 2022a)。在这一背景下, 《十年回顾》对中国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对比价值, 又有一定的前瞻性启发。

三 对于中国未来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研究的展望

在离婚、再婚、继亲家庭领域, 中国需要哪些研究? 第一, 《十年回

顾》的核心观点“婚姻是一种持久的分层和制造分化的机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能够形成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对比研究。前文回顾了美国和中国在离婚者社会特征上的差异性,如果回到家庭行为变迁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来理解,美国是典型的弱势模式,即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迫于资源压力越来越难以进入婚姻或维持稳定的婚姻关系,而中产/上层家庭为了个人和下一代的福祉日益向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回归,这种家庭行为之间的剪刀差变化成为底层与中产/上层家庭孩子命运分化的来源(Putnam, 2015)。与美国形成对比,中国自20世纪末以来的家庭行为变迁以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为主导(Yu & Xie, 2015),往往是城镇、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可能选择前卫的家庭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离婚等家庭结构变动对子代的影响在中国较小。不过,随着中国家庭行为变迁向其他群体扩散,其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是否会从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转向弱势模式是一个尚未回答的问题(张春泥、谢宇, 2022b)。前文已提到,目前已有新的证据表明了中国离婚者的特征正在发生转变的迹象,这对离婚者及其后代的处境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是值得持续关注的议题。

第二,国内研究也可以借鉴美国研究,对研究议题进行深化和拓展,形成一些具有现实价值的选题。首先,《十年回顾》中提到非婚同居作为一种替代婚姻的家庭形式,对离婚风险和再婚行为产生影响。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针对婚前同居行为的研究(例如:梁同贵, 2017; Yu & Xie, 2015; Yu, 2021),但缺乏对离婚后的同居现象以及同居与再婚家庭婚姻稳定性关系的研究。其次,《十年回顾》强调应加强对家庭关系变化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关注,特别提及了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以及继亲家庭的隔代关系,这些方向在中国大有可为:一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离异单亲家庭和继亲家庭,二是离异家庭更可能与祖辈同住或获得祖辈的隔代照料帮助(张春泥, 2019)。未来国内研究也可以深入探讨离异单亲和继亲家庭中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性质,继祖父母与继孙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离异家庭儿童的处境与福祉。最后,应开始加强对中老年人离婚及其晚年生活影响的关注。《十年回顾》提到美国学界近十年越发重视“银发

离婚革命”现象。而中国由于早期出生队列的婚姻很稳定，所以大量研究仍关注的是青年群体的离婚和再婚行为。但随着经历1980年代“离婚潮”的一代人已迈入老年，他们曾经的离婚和再婚行为对他们晚年家庭关系和生活的影响值得更多研究，这也是与中国老龄化相联系的议题。目前在这方面国内只有少量研究关注老年人的离婚、再婚及其对老年生活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城市离婚老年人比例有所上升（孙鹃娟，2015），离婚后再婚者相比于未再婚者较不可能获得子女的照料（Hu & To, 2018）。

第三，中国学者如何更好地推进这一领域的家庭研究？从《十年回顾》所展现的美国成熟经验来看，一是要从人口和分层的角度持续关注家庭结构的变化。离婚、再婚等家庭行为直接反映在家庭结构的变化上，中国的单亲和继亲家庭目前仍主要是由离婚、再婚行为造成的。家庭行为的人口分布会持续变动，我们研究离婚、再婚、继亲家庭现象时总不可避免地要时刻关注谁是离婚者、谁更可能再婚和成为继父母。而离婚者、再婚者、继父母的社会阶层来源也决定了他们在应对这些婚姻事件时所带入的资源和面临的约束。因此，婚姻家庭的研究者应从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发现问题，从人口变化中寻找原因，从社会分层中探讨后果。二是要重视家庭数据的积累和采集。中国婚姻家庭领域研究创新的短板之一在于数据，微观数据的缺乏限制了社会学想象力的发挥。描述和探讨婚姻的变化历程与前因后果需要长期的回溯性或追踪性的数据，也需要能够将夫妻、亲子相关联匹配的数据，还需要涵盖更多婚姻行为的细节、态度以及能将之与个体人生发展（如教育、就业与工作、健康、生活方式等）相联系的数据。此外，《十年回顾》中提到“应加强对当代复杂伴侣关系和家庭组成方式的描述性和定性研究”。目前国内不乏对新家庭行为的定性研究，但这些基于个案的洞见仍有待被更大规模数据所检验。未来应加强定量与定性研究成果的学术对话，共同深化对中国当代婚姻现象及其社会后果的认识。

参考文献

董浩，2023，《此情或可待：“离婚冷静期”规定对离婚登记数量趋势的影响》，《社会

- 学研究》第1期。
- 李永萍、杜鹏, 2016, 《婚变: 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J村离婚调查》, 《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梁同贵, 2017, 《婚前同居与初婚离婚风险——基于CFPS2010数据的分析》, 《南方人口》第4期。
- 刘汶蓉, 2019, 《青年离婚变动趋势及社会原因分析》, 《当代青年研究》第6期。
- 马忠东、石智雷, 2017, 《流动过程影响婚姻稳定性研究》, 《人口研究》第1期。
- 莫玮俏、史晋川, 2015, 《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彭大松, 2015, 《个人资源、家庭因素与再婚行为——基于CFPS2010数据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施磊磊, 2020, 《个体化进程与农村青年离婚的形成机制——以皖北Y村为个案的质性探究》, 《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 石智雷, 2020, 《区域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基于跨省流动人口的研究》, 《社会》第1期。
- 宋健、李灵春, 2022, 《“离婚冷静期”政策能否降低离婚水平》, 《探索与争鸣》第8期。
- 宋月萍、刘志强、王记文, 2022,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口学刊》第1期。
- 孙鹏娟, 2015, 《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变化趋势——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学刊》第4期。
- 王会, 2020, 《婚姻主导权与中西部青年妇女地位考察》, 《当代青年研究》第3期。
- 吴德清, 1999, 《当代中国离婚现状及发展趋势》,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徐安琪, 1997, 《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2003, 《单亲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 《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 , 2001, 《父母离婚与子女犯罪关系的学术拨正——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的回顾及评估》, 《青年研究》第9期。
- , 2012, 《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一个综合解释模型探讨》,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王友竹、周开雾、夏国美, 1987, 《父母离异的学龄少儿的调查》,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叶文振, 2001, 《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来自上海的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许琪、于健宁、邱泽奇, 2013, 《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杨记, 2007, 《影响再婚的个人和社会因素分析》, 《西北人口》第1期。
- 殷晶晶、班涛, 2021, 《市场区位: 理解农村年轻人离婚空间分布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 於嘉、赵晓航、谢宇, 2020, 《当代中国婚姻的形成与解体》, 《人口研究》第5期。

- 曾毅, 1995, 《中国八十年代离婚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春泥, 2019, 《离婚家庭的孩子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20, 《中国家庭婚姻破裂对子女成就的长期影响》,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期。
- 、潘修明, 2022, 《中国儿童家庭养育投入现状报告》, 载苑立新主编《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2)》,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谢宇, 2022a, 《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上篇): 研究视角的融合》,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5期。
- 、谢宇, 2022b, 《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下篇): 中国经验研究》,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6期。
- 张晓冰、王记文, 20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离婚水平变动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第9期。
- 张雪霖, 2016, 《阶层分化、社会流动和农村离婚新秩序——以鲁西北C村离婚经验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 Amato P R, Keith B. 1991. "Parental Divorce and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
- Amato P R. 2001. "Children of Divorce in the 1990s: An Update of the Amato and Keith (1991)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
- Chen M, Rizzi E, Yip PSF. 2020. "Divorce Trends in China Across Time and Space: An Update."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1.
- Cong Z, Pei Y, Silverstein M, Li S, Wu B. 2023. "Children's Divorce and their Financial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 in Rural China." *Research on Aging* 2.
- Hu Y, To S. 2018. "Family Relations and Remarriage Postdivorce and Postwidowhood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8.
- Liao C, Heaton T B. 1992. "Divorce Trends and Differential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
- Ma L, Turunen J, Rizzi E. 2018. "Divorce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
- Martin T C, Bumpass L L. 1989. "Recent Trends in Marital Disruption." *Demography* 1.
- Putnam R D. 2015.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aley R K, Sweeney M M. 2020. "Divorce, Repartnering, and Stepfamilies: A Decade in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
- Wang Q, Zhou Q. 2010. "China's Divorce and Remarriage Rates: Trend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4.
- Weitzman L. J. 1985. *The Divorce Revolution: The Unexpecte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Yu J, Xie Y. 2015. "Cohabitation in China: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

- Yu J., 2021. "Union Formation and Childbearing among Chinese Youth: Trends and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
- Zeng Y, et al. 2002. "Association of Divorce with Socio-demographic Covariates in China, 1955–1985: Event History Analysi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in Shanghai, Hebei, and Shaanxi." *Demographic Research* 7.
- Zhang C. 2020. "Are Children from Divorced Single-parent Families Disadvantaged? New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1.
- Zhang C. 2022. "The Effect of Parental Divorce on the Sexual Life and Marital Well-being of Offspring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